

纪念长征出发七十周年

新华社军分社、北京青年报联合推出

我的长征

寻访健在老红军



下册

监制：黄国柱 张雅宾
策划：贾永 何平平 陈新

寻找 抢救 记录 感动

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

国防大学 2 090 3826 3

我的长征



—— 寻访健在老红军



编委：黄国柱 张雅宾 孙伟
何平平 贾永 陈新
监策：黄国柱 张雅宾
划：贾永 何平平 陈新



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

编 委:黄国柱 张雅宾 孙 伟

何平平 贾 永 陈 新

监 制:黄国柱 张雅宾

策 划:贾 永 何平平 陈 新

采访记者:新华社军分社 徐壮志 白瑞雪 孙彦新 李国利

梅世雄 王洪山 吴登峰 张 琦

李石元 孙茂庆 李大伟 陈万军

李清华 张选杰

《北京青年报》社 于 巍 甄 颖 刘建武 范海涛

编 辑:陈国华 牛 嫱

谢海泉：敌营里面藏伤员

采访时间：2004年5月19日

采访地点：四川省广元市干休所谢海泉家中

采写人：宋朝华、白瑞雪

拄着拐杖，几乎是被老伴架着，走路还是一步一蹭，颤颤巍巍。老伴一松手，88岁的谢海泉重重地陷进沙发。

断粮40多天，草地快走完了时他拿出半袋珍藏的小麦与大家分享；“艺高人胆大”，药品不够，干脆把伤员从地道送进敌人的医院；黄金、美女、恐吓、暗杀，全不吃这一套，他要把这帮特务一网打尽；右臂打折腰打残，妻女双双被吓疯，“文革”中拿到生活费的第一件事，还是交党费……



悲情童年：12岁便与20岁的童养媳成了亲，媳妇拿他出气，非打即骂；谢海泉逃了出来，母亲哭着给他一只缺了一半的碗和一根竹棍，“讨饭去吧”，他没去。

4岁时父亲病故，6岁时过继给大妈，8岁时大妈将侄女许

敌营里面藏伤员

我的友徒 谢海泉

谢海泉简历：

四川苍溪人。1916年出生，1933年参加红四方面军三十一军，任宣传队队长。抗日战争期间任指导员、组织科长等职，曾参加娘子关等重要战役，并组织地下党多次把伤员从地道送进敌人医院治疗。延安整风期间，被扣上“反党和个人主义”的帽子，徐向前一句“他是我看着长大的光屁股娃娃”，救了他的命。抗战胜利后到东北参加地方工作，曾担任四平市公安局局长、黑龙江省农科院副院长等职。



给他做童养媳。谢海泉 12 岁便与 20 岁的童养媳成了亲。

谢海泉“年龄太小不懂事，给她精神和生活上造成很大的痛苦”，媳妇就拿谢海泉出气，非打即骂。

谢海泉逃了出来，母亲哭着给他一只缺了一半的碗和一根竹棍，“讨饭去吧！”

谢海泉没去讨饭。他靠给人带路挣了两个铜板，再用这两个铜板买来 40 个桃子去卖，又挣了两个铜板。两年后，当他有了三块半大洋时，大妈将他接回了家，送他去上学。

学校里的邓老师常常留谢海泉吃饭，给他讲：“以后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土地。”谢海泉惊讶得“稀饭都从嘴里流出来了”。

邓老师讲的那些让人半懂不懂的“布尔什维克”、“苏维埃”，让这位忧郁的大巴山少年对未来充满了憧憬。他坚信，跟着邓老师干有出路。

果然，1932 年红军一入川，邓老师便到了乡苏维埃政府，“土地真的分了下来！”更让谢海泉惊喜的是，自己居然也当上了保卫乡苏维埃的儿童团长。

第二年，当红四方面军到达苍溪时，谢海泉已是当地的赤卫队员了。他报名参军，连长嫌他“年纪小，打仗跑不动”，指导员却把他拉了过来。几天后，连长竖起了大拇指：“不错，3 天学会了 4 首歌！算合格了。”就这样，谢海泉撇下媳妇参加了红军。



离奇长征：“草地中我留下了 5 斤小麦”，谢海泉动过好几次吃小麦的念头，“但我还是忍住了。草地过了肯定又是一场硬仗。到时找不到吃的就都完了。”

一过雪山就断炊了，谢海泉留下了 5 斤小麦，他将粮食袋



牢牢系在腰间，前面就是茫茫草地。

草地行军的第一天傍晚，谢海泉带着他的宣传队住进了一片森林。林内蘑菇满地，大家采来蘑菇穿在枪的捅条上烧着吃。

谁知火光惊动了林中的野兽，四下响起一片虎熊的怪吼，战士们吓得连连朝天放枪。不想枪一响，“天被我们打漏了”，天色陡暗，雷声震天，大雨倾盆。很快水已没膝，大家只得往树上爬。突然，树上传来女战士的尖叫，好多战士吓得掉下树来——树上盘着好些巨大的蟒蛇！

以后的路越走越苦，谢海泉动过好几次吃小麦的念头，“但我还是忍住了。草地过了肯定又是一场硬仗。到时找不到吃的就都完了。”

腰带吃光了。路上捡的烂皮鞋也吃了。就连搞宣传用的鼓皮也不得不吃了……

突然，前方发现了炊烟！“快出草地了！”黄昏，草地一片欢呼。“有了人烟就有吃的”，谢海泉费力地把那袋小麦从腰间解下来。

发黑了，生芽了，好些麦粒胀得有黄豆大了。十多双饥饿的眼里，见到的还是黄灿灿的不可思议的小麦。官兵们你一把，我一把，直往嘴里塞。他们已经断粮 40 多天了。

叫人沮丧的是，出了草地，他们并未找到一粒粮食。老百姓全被赶进了山，剩下的粮食被胡宗南部队付之一炬。头一天所见的烟火，正是焚烧粮食的浓烟。

一位“有亲戚在陕北”的老汉没有跑，他将谢海泉和他的宣传队带进了一片土豆地。

夜里，发现宣传队不见了，军政治部主任大发雷霆。四下寻找，警卫连将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宣传队员从土豆地里抬了回来。吃了发芽土豆，谢海泉他们全都中毒了。



第二天醒来，谢海泉发现部队正在紧张构筑野战工事。胡宗南的部队马上就要打来了。

每人只有三四发子弹。上级命令，敌人到了工事前三四米才准开枪，“一定要把枪弹从敌人手中夺过来！”

战斗打了一天。部队不但缴获了枪弹，而且还得到了黄豆、玉米、小麦、土豆、面粉，甚至还缴得了一头猪和两只羊！“现在的任务是，集中精力做好饭。”上级再次下令。

哪里还等得到把饭做好。“好多连队还没等到把水烧开，就你一把我一把，锅里的东西全给捞起来吃光了……”



铁血抗日：“我们把伤员从地道送进日军医院”，在日军医院当医生的地下党员嘱咐：“一定要给伤员说好，无论如何也不准说话。说话就晓得是中国人了。”

1937年8月，红四方面军余部在陕西三原改编成八路军一二九师，谢海泉到了三八六旅七七一团当指导员。部队很快向抗战前线开进。

在山西阳泉一下火车，就与日军交上了火。

“同志们，杀呀！”炮火纷飞的战场上，谢海泉大喊，“日本鬼子眼睛是灰的，太阳光一照，他们都是睁眼瞎啦！”

只听别人这么说过，鬼子到底能不能看见，谢海泉心里也没底。反正这第一次跟鬼子干仗，他们连队就消灭了23个鬼子。上去一看，“眼睛颜色跟我们也差不多啊？”“可能是鬼子死了，眼睛就变色了吧。”战士们这样议论。

以后的战斗就频繁了：神头伏击战、广阳侧击战、响当铺阻击战，一战比一战惊心动魄。现行初中教材《中国历史地图册》上，就有一幅谢海泉所在部队拿下娘子关的图片，注释



为：“1940年8月20日，八路军发起百团大战当天，攻克日军重要据点娘子关。”

1942年日军“四二九”大扫荡，谢海泉被日军冲散。在寻找部队途中，他被敌人追踪。行至一个叫杨庄的村子，一位老太太把他藏进红薯窖。

老太太坐在窖边纺线。日军追进她家乱翻一通，朝谢海泉藏身的窖里放了5枪，然后就往窖里尿尿。子弹没打中谢海泉，敌人尿尿时他却紧张起来，“窖上只稀稀拉拉盖了几根高粱秆，一个敌人脚上松了的鞋绳耷拉下来”。

敌人在老太太家杀鸡宰羊吃喝一通，走了。

“那个时候，只有敌人，没有敌区。哈哈，我们钻进了敌人的肚子里。”谢海泉说，“最讨厌的是汉奸，最好使的也是汉奸。”

他们给汉奸记“黑红点”。汉奸干了坏事记个黑点，做了好事就记个红点。黑点多了，就提出警告。他们曾将一个李大麻子的耳朵割掉一只，并说“要想保住狗命，就得立下为人民做好事的字据”。李大麻子立了字据，也变好了：谢海泉不但可以从他那搞到一些情报和药品，还可让他出面做些大事——冀南军区陈再道司令员到延安要过平汉铁路，李大麻子就出面护送，他还在马尾上拴了树枝，为陈再道的马队消除痕迹。

部队伤亡很大，单凭汉奸送来的药品远不够用，任新四旅卫生处政委的谢海泉非常着急。

当时的地道战已臻成熟。敌人来扫荡了，谢海泉他们就通过地道，转移到敌人的据点下面去隐蔽；敌人走了，再回村庄。谢海泉说，这叫“灯下黑”。

从“灯下黑”得到启示，谢海泉想：为啥不把地道挖到敌人的医院去？



地道真的挖通了。接应伤员的是在日军医院当医生的地下党员，“一定要给伤员事先说好，无论如何也不准说话。说话就晓得是中国人了。”“要得，要得！”谢海泉操着浓浓的川腔满口答应。

就这样，在抗战相持阶段，新四旅大部分可集中的伤员通过地道混入了日军病房。伤好后再从地道悄悄回来，投入新的战斗。



激情抗大：“徐帅的一句话救了我”，“他是我看着长大的光屁股娃娃，党一直培养的干部，他怎么会反党呢？”

1943年，谢海泉受命回到延安参加抗大学习。

“团结、紧张、严肃、活泼”，宽松的抗大校风和学风导致了思想的空前解放。抗大总校副校长何长工每次讲完课，总是习惯性地谈最后一个问题。这时，一向拘谨的谢海泉也会同大伙一起，南腔北调地把何长工要说的话给唱出来，“老——婆——问——题！”何长工笑了。

当时延安的男女比例是8:1，有人提出了找对象的三个条件：“一是人，二是女人，三是活着的女人。”虽然当时谢海泉已在根据地与一位女游击队长结了婚，但他还是在笔记本上感慨道：“人生三大事：一是得到党的信任，二是拥有健壮的身体，三是找个如意的伴侣！”

徐向前的课上，一位干部非得要跟谢海泉低头谈“老婆问题”，结果徐向前把他们两个都叫了起来。“立正！”徐向前冲他俩下了口令，“自己看好时间，站半个小时！”后来谢海泉经常给部下讲起这件事，希望他们能够理解自己对部属的严格要求。



徐向前在课堂上罚了谢海泉，却在后来的政治运动中巧妙地救了谢海泉。

延安整风运动中后期，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动员报告，掀起了“抢救失足者运动”，10余天造成了大批冤假错案。谢海泉暗自为受冤同志叫屈，他在日记本上写道：“青春蓬勃发，狂风暴雨打。哑巴吃黄连，痛苦有何法？”

就因这四句话，支部认定“谢海泉对延安整风不满嘛！”再加之笔记本上写的“人生三大事”，就给他扣上了反党和个人主义的帽子。

“大会小会，批判了我一个礼拜。”谢老说话声音有些颤抖，“要不是毛主席提出‘大部不捉，一个不杀’的话，恐怕我这脑袋是保不住了。”

徐向前在抗大总校大会上给谢海泉平了反。谈到“抢救运动有些地方做得也有些过头”时，他放下了讲稿，说：“比如说谢海泉同志，他是我看着长大的光屁股娃娃，党一直培养的干部，他怎么会反党呢？”

就这一句话，谢海泉得救了。

1945年8月抗战胜利时，他被派往东北，当了四平市的公安局长。

当时的四平，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活动猖獗。谢海泉曾抓了一个特务入狱，特务老婆马上给谢海泉送来两条黄金。见他不收，又送来两名美女，还是无效，她便放话恐吓，谢海泉一笑：“枪林弹雨里走过来的人，还怕你这些小把戏？”女特务果真带了两个人来刺杀谢海泉。“我就把他们几个一网打尽了。呵呵呵。”躲在沙发里的谢老孩子般窃笑。



坎坷暮年：爱妻因精神失常，抑郁而死，女儿至今生活不能自理；“断了胳膊残了腰也要交党费”。

“文革”开始，谢海泉受到迫害，右胳膊和腰相继被打残，老伴和女儿被吓得精神失常。

最让谢海泉受不了的是，“他们竟敢不让我们这些老党员过组织生活！”那些人还克扣他的工资，每月只给他一点生活费。但一拿到钱，谢海泉首先是把党费交上，剩下的才去买米买煤，再给妻女买药品。

1969年，任黑龙江省农委副秘书长的谢海泉下放到一个叫南阳的大队，当了支部副书记。听说“那里的斗争很复杂”，谢海泉最初不敢去，但他想起了毛泽东说过的一句话：“什么叫工作？工作就是斗争。越是困难的地方越是要去，这才是好同志。”这样，他卷着铺盖和5棵大白菜去了。

南阳大队在给他的鉴定上记道：工作3年，谢海泉“打上了当年红军的裹腿……累得4次吐血，为他做饭的社员感动得哭了”。

“文革”终于过去。1978年1月，黑龙江省一位领导找谢海泉谈为他平反和安排工作的事，谢海泉说：“一个革命者，当他失去为党为人民工作（机会）的时候，那是最痛苦的！”

谢海泉放声痛哭。压在他心头12年的巨石终于搬掉了，但爱妻却在半年前，“因精神失常，抑郁而死”，女儿至今生活不能自理。谢海泉越哭越伤心。

“我还能干工作，不死就要干革命！”领导却拿着一份中央关于废除干部终身制的文件，再次找谢海泉谈话。刚回工作岗位不久的谢海泉说：“要按我的思想，我还想干；要按我的身体状况，我还能干；要按党性原则，我听组织的！”



古稀老人面临孤独晚年。组织上为他介绍老伴，他不肯，他要叶落归根回四川。1985年10月路过四川老家时，与当地一个45岁的“崇拜老红军”的女售货员结了婚。两年后，谢海泉因不堪忍受蛮不讲理的中年妻子的“人格侮辱”，离婚了。

给各阶层作传统报告，成了谢海泉离休回四川广元后的主业。现在的老伴是照顾他生活起居的保姆，她说：“每次报告都要写讲稿，常常晚上睡一睡又爬起来写，眼睛红肿了，就用凉水洗一洗。”这样，谢海泉完成了36万字的演讲稿。

香港回归，谢海泉特别激动，挨家挨户去宣扬国家的繁荣。中英交接仪式结束后，他又兴奋地打电话给老战友和老领导表示庆贺。

广元老城区改造，许多居民暂时无法经营小摊点，一时反响很大。谢老又拉上其他老红军挨家游说：“为振兴广元经济，要顾全大局。要以发展的眼光看问题，广元发了，还怕你不发吗？”离休后，他曾先后7次北上哈尔滨和北京，为广元经济的发展联系资金和项目。四川省政府给他颁发了“老有所为奉献奖”。

记者手记：

哭吧，谢老

“会不会影响他的身体？”听说谢海泉怕提往事，我十分担心。领路的老干局的同志说：“莫担心。谢老不管和哪个提起过去的事，都要哭的。”

一闸锈迹斑驳的铁门歪歪斜斜地张着嘴，楼下是污水四溢的商业区，楼上是昏暗逼仄的住宿区。

一敲门，半天门才开。屋里光线更暗，我摸索着在客厅里落了座。



“咚，踢踏”，“咚，踢踏”。一抬头，一位老人拄着拐杖被人架着挪进了客厅。“谢老，您好啊！”我赶紧起身。

“好啥喔，都要死的人了。呜呜呜……”他真的哭了起来，像个孩子那样，毫无顾忌地哇哇大哭。我吓了一跳，采访计划全乱了。

终于，谢老平静下来，不哭了。他哆哆嗦嗦地从装药的抽屉里拿出几份打印文档给我。一份是《我对长征的回忆》，一份是《关于抗日战争问题的回忆》，一份是《延安精神永放光芒》。

我迷茫地看着谢老。谢老用力拄着拐杖端坐在沙发上，说：“这些都是我给他们作报告用的演讲稿。我没有一句提到过我个人的不幸啊。呜呜呜……我还说过共产党员永远不退休呢。可我，可我现在，我现在就连报告都不能作了啊！呜呜呜……”

谢老又抽泣起来，使劲捶他的腿，搥他的腰。我没有阻止他。

哭吧，谢老。

袁林：长征路上“袁破坏”

采访时间：2004年5月18日

采访地点：江西省吉安市干休所袁林家中

采写人：徐壮志、梅世雄

从南昌出发时，听说有一位曾接待过毛泽东和朱德的长征老红军袁林，记者就一直在多方寻找他的下落。没想到，在吉安市无意中打听到了他的下落——原来，老人现在住在吉安的他儿子家里。

真是得来全不费工夫。在吉安市干休所工作人员的带领下，记者顺利地在一幢普通的居民楼里，找到了袁林。

91岁的袁林耳朵背得很厉害，一口永新话也非常难懂，但是当他听懂我们是为纪念长征开始70周年而来寻访健在的老红军后，显得非常激动，在他妻子的耐心帮助下，我们的采访艰难地展开了。

长征路上「袁破坏」

我的长征 袁林

袁林简历：

1912年生于井冈山下的永新县南乡长富乡袁家村。1928年参加少先队，1930年参加红军。1931年，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代表参加了大会。长征开始后在红军总政治部破坏部工作，历任破坏干事、破坏科长。

抗日战争中，在红军第二十七军政治部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部部长，后任团政委。八路军后方留守兵团警备第一团营教导员，新四军营教导员、团政委。1959年奉命组建井冈山管理局机构，先后接待了朱德、毛泽东重返井冈山。



弹雨中，袁林跑到一条最高的田坎上，吹起冲锋号……

三发炮弹几乎同时在袁林身边炸开，气浪把他高高抛起，倒在稻田里。

1930年4月，还差半年才满17岁的袁林参加了红军，在红二十军当战士。营里缺少号兵，就选了袁林等三个年纪小的战士学习吹号。

“那阵儿，做梦都想拿枪上战场，一听说当卫生兵、炊事兵，满肚子不高兴。”直到今天，袁林还记得最初成为号兵时那种不满。

惟一令袁林欣慰的是，营长给他弄了顶军帽，军帽上的红星是红布剪裁而成的——那是惟一能体现他是红军的标志。

第一次战斗，袁林不仅没能吹响军号，还犯了个错误。

一开战，暴雨般的子弹呼啸着，打在他前后左右的稻田里，直冒水泡。袁林觉得每一颗子弹都是冲自己而来的。三小时以后，红军战士冲到山顶铁丝网前，敌人蜂拥而出，双方展开肉搏战。红军战士敌众我寡全部阵亡。

战争如此惨烈，袁林看呆了，不仅没吹军号，甚至没有听到撤退的命令。结果受到了司号长的严厉批评。

在水口激战中，站在连指挥所的袁林，亲眼看到自己朝夕与共的号兵一个个倒在敌人的枪下。

袁老回忆说，当时，全团只剩下不到二百人。后来当了开国上将的师政委朱良才把他们整编成一个连，由师参谋长耿飚代理团长。

朱良才问：“你们团还有几个号兵？”

“就我一个。”袁林说。

“不能让敌人停歇，吹冲锋号，攻占对方的山头！”朱良